



费孝通 先生

# 更高层次的文化走向



——在景德镇 99 传统手工艺百年回顾研讨会上的讲话<sup>③</sup>

今天是由《装饰》杂志社、北京工艺美校、景德镇民窑艺术研修院共同举办的 99 传统手工艺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大家要我在这里做一个学术报告，我首先要声明的是，我做的不是报告更不是学术报告，而是和艺术家们见见面，谈谈天。

我去年到退休的法定年龄了，但我是退而不肯休，因为我还有几件事没有做完，还希望把它做完。曾经有人问我，你一生究竟要做点什么事？我在八十岁的生日时回答过这个问题，那就是“志在富民”。我一生所做过的事，回过头来看看，就是想要为老百姓增加一点财富。通过这几年的考察我看到了，在我国的东部地区比较发达，但到了中部就出现了一个台阶，也就是下来了。东部地区也就是沿海地区的农民年收入是 5000 元上下，而在江西这样的中部地区，农民的年收入只有 2000 元上下，这两个地区的农民收入相差一半。我一直在想怎么把这中部地区发展起来呢？我认为有一个机会，在京九铁路通车的时候，我曾参观过这一条铁路。当时我就想，要利用这条路来发展沿途的经济。有一

<sup>③</sup> 这是费孝通先生在 99 传统手工艺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是在景德镇民窑艺术研修院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是来自全国各地和日本的手工艺理论研究的专家。



1911

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 1879—1969 )

曾在科举考试中取得生员资格。1905 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曾应张謇先生之邀赴南通当教师，举办新学。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与民众一起赶走苏州及吴江县的满清官吏，并被选为吴江县议长。后任江苏省教育厅视学，一心从事教育。

句俗语说，“要发展，先造路”。现在路是通了，但有很多例子告诉我们，交通通了也不一定能发展。在少林寺和尚中流传一句话叫“酒肉穿肠过”，交通是通了，车过了，但并没留下什么东西。我的意思是说，京九铁路是通了，但如何让它不是酒肉穿肠过。我就考虑，要让京九铁路串成一串糖葫芦，这一个一个糖葫芦就是一个一个中等城市，就是要沿着京九铁路发展一批中等城市。

我以前是研究农村的，从六十年前就开始研究中国农村，但到八十年代后我就看出来，光是靠农村不能富民，一定要有城市，要由城市带动农村。有了这一个个的糖葫芦，周围的农村就不会让酒肉穿肠过了。所以从去年、前年开始我就一个一个的糖葫芦去走，我去年到了安徽、湖北还到了江西的南昌、九江，今年到了赣州，目的也是串糖葫芦，在赣州我看到了江西南部发展的一个支点。从赣州我就转过去了，转到京广路，在那里我到了株洲，到了株洲，我想到你们了。当地人告诉我，在二十年前株洲还很小，只有七千人口，但现在已发展成为有一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了。二十年由一个不到一万人口的地方，发展到一个拥有一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真是发展得很快。我想，株洲在湖南等于你们景德镇在江西的地位，假如你们能发展起来，就是一个新的洲州。而景德镇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要发展可以走传统加科技的路。邓小平南巡之后国家发展很快，株洲是一个典型，它发展得起来是因为有几个引进了高科技的大集团大企业。景德镇也一样，要发展起来也必须有几个大的集团企业，年产值达十亿左右，这样这个城市就稳了。刚才舒书记（景德镇市市委书记）的讲话，我听了很高兴，我还不知道你们有这么大的本领，实力还不错嘛。

过去我总觉得我们中华文化的来源是在黄河以北。但考察以后才知道，南



1911

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1880-1927）于1911年和子女们的合影

怀中所抱是刚满8个月的费孝通。

方实际上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中心。去年我到了长沙，参观了马王堆，在那里出土了一大批竹简，现在还没有完全翻译出来，但这些竹简告诉我们，当时长沙是属于吴国的，吴文化是很强的，吴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讲的多是黄河以北的文化，夏商周都是黄河以北的嘛。黄河以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这不成问题，许多考古成果都证明了这一点。但长江以南作为中国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发源地，却还没有得到更好的证明。七千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就已经有了水稻，还发现了蚕丝，说明已经有了纺织。在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中还发掘出一个很完整的文化地带，这告诉我们在长江流域这么早就有发达的文化了。而且，长江流域的吴越文化水平也很高，据说中国的稻作文化的发展就是以吴越地区为中心的，甚至还有一种说法，吴越的稻作文化通过海上的传播，发展出了最早的日本文化。这种稻作文化影响了几千年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你们江西是属于南方，在当时应该是属于吴国的统治地带，因此，也带有吴文化的历史。这种文化和今天是有关系的，这种文化在江浙一代发展出了传统的丝绸文化，在历史上浙江还是瓷器的故乡，越窑的瓷器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后来衰落了，瓷器的中心转移到了江西。丝绸和瓷器都是中国最有名的手工业产品，它们不仅在历史上存在，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发展，还在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今天会议的主题是 99 传统手工艺百年回顾，昨天晚上我同方李莉谈了很多，我说，我对手工艺的历史并不是很清楚，但在这个研究中，我觉得南方文化应该受到重视，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有两个来源，一个北方来源，一个南方来源，它们是相互补充的，这也是我的中国文化发展多元一体理论的根据。有关北方文化大家发掘得多了，但南方文化还是刚刚开始，大概在今后的



1911

费璞安、杨纫兰与长子、女儿合影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城（旧属苏州府，今为松陵镇）的富家桥弄。费璞安、杨纫兰与长子、女儿合影（1911年）。

我生在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我父亲是江苏省的“视学”，即教育督导员，我母亲是首创蒙养院即幼儿院的当时妇女界先进人物。我的父母上有祖母和她守寡的妹妹，下有子女五人，我是老五。一家九口的生活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来供养。母亲在家以有限的收入经营管理这个小集体。当她

二十年里在历史学上会有一个新的发展。等长沙的竹简翻译研究出来，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就如甲骨文出现以后中国的历史学界产生了一个大的变化一样。但我对手工艺的发展不清楚，历史也不太了解，所以你们讲手工艺的昨天，我只能讲手工艺的今天和明天。缩小一点来讲，我想讲瓷都景德镇的今天和明天，就你们讨论的主题来讲，我这个题目出了题，出了格，写文章不能出格嘛。但在我的一生来讲，做学问都是出格的，人家说我是人类学，其实我已经走出去了，说历史学我也走出去了。我的学位是人类学，人类学是什么都可以包括在里面，只要是人做的事情都可以包括在里面，像考古学、艺术学都可以是人类学的一部分。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圈外人语”，也就是说我没有固定的一个圈子，写文章也没有固定的一个格式。（旁边人插话：这不叫出格，叫创新），当然，一个人要老在一个格子里就创不了新，这倒是个千真万确的道理。

方李莉是从景德镇出来的学术理论专家。她想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艺术学，所以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完成博士学位后，就来到了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我是退而不休，一直保持了在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学术理论指导的工作，就是她对景德镇的考察把我引到这里来的。我到景德镇一共来过两次，两年以前来过一次，没呆几天。我对陶瓷和其他手工艺都有一定的爱好，这还有一定的历史。解放初，我在清华大学当副教务长，分管文科。当时我对北京的手工艺很有兴趣，我曾想搞一个有关北京市景泰蓝的研究课题。那时彭真同志是市长，为这事我们接头了，后来没成功，主要是我被调到民族事务委员会去搞少数民族工作调查去了。在这个工作中，我们收集了一批少数民族文物（少数民族工艺品）。我讲这些是表示我对手工艺有过的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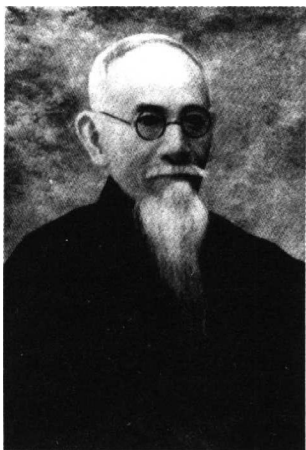
病重时，曾要我几个哥哥根据历年的日用账进行统计分析、按各项支出画成曲线，并列在一张表上。用红线表示的教育费用高高居上。她指着这张表说，她的理财原则是量入为出，先扣除教育费用然后以余额安排其他项目。我曾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中重复我母亲的理财原则，希望国家也能采用。我母亲按这个原则把五个子女都培养成才。在她临终时说，除了最小的一个外，我对子女的教育是尽了力的，结果也能使我放心。她除外的一个就是我。我当时还是个中学生。我进大学是靠我姐姐的支持，进入了研究生院以后就靠国家的公费，完成了我的学业。一生督促着我不敢自暴自弃的还是我母亲的那句遗言。

费孝通：《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1994）

接触。

据说景泰蓝的技术被日本人窃取去了，而且在我们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认为，文化总是要传播的，从商业上来讲，好像是我们的一个专利被人家拿去了，但作为文化的流传，就是要交流、要发展嘛，就是要大家比、大家竞争嘛。文化不怕比赛、不怕流传，我们现在要学习西方的高科技，就是要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发展我们自己。所以别人要把我们的传统工艺拿去发展，也是可以的嘛，我不反对，我是主张文化交流，大家一起发展的。这也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道理、一个规律。

我从方李莉的调查中，看到了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景德镇的一部分陶瓷又回到了家庭式的手工艺生产，（旁人插话：这是景德镇的个体户），对，是个体户。但这个体户的经济我们不要小看了它，从理论上来讲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回过头去看看从人民公社到分田到户，到家庭生产责任制。我记得胡耀邦同志和我讲过几句话，他说，你不要忘记，中国社会最权威的细胞是家庭。这个话同我的调查是完全相符合的，我写的第一本书，叫《江村经济》，里面的第一章就是讲中国的“家”。“家”是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组织的细胞，后来我在这基础上发挥了几点，写了一本书，叫《生育制度》，这是我在自己学术研究方面的经过，但是实用起来，可以用它来解决一些问题，这还在探索之中。现在闹下岗问题，也是首先回到家庭。再如，我现在退休了，也是靠女儿、女婿生活，还是靠家嘛。在我们的东方文化中“家”、“家族”是要发挥很大作用的。你们研究手工艺、发展手工艺，其实手工艺就是家庭生产里面的一个部分，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这原因讲起来很长了，为什么中国的家是社会的一个细胞，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要是善于用它



费孝通的外祖父杨敦颐（粹卿）



费孝通的外祖母

的话，它的积极性就来了，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培养出来的，道理也讲不清楚，可是大家都感觉到一回到家就不同。我在昆山考察时看到一个专门做童车的乡办企业，这童车的牌子叫“好孩子”，这个企业现在已经是几十亿的资金了，他们也是从十几万开始发展起来的。所以许多企业不要看它小，只要它找对了市场，根据文化的要求和特点来发展，就会有发展。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只要结合了家庭就会有发展、有市场。这里我还要举一个有关陶瓷的例子，我在山东考察时认识一个很大的企业家，他的出身是卖碗，也就是瓷器。他最早是挑瓷器卖，他说瓷器是会打破的，而且家家户户要，农民需要大量的碗茶杯。所以他挑着担子到农村去卖，生意很好，由他开始，后来带动了一个村庄都做这种生意，现在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大的企业，并且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搞艺术瓷，也要搞日用瓷，要生产农民所需要的东西。当然将来农民也会需要艺术品，那是明天的事情，但是今天还不行，因为他们的年收入还只有两千元，所以生活的艺术化还谈不到。这就要靠你了（对景德镇市市委书记说），怎样让农民的生活从两千元提高到五千元，赶上我们的苏南、沿海。我看如果农民的收入从两千元提高到了五千元，市场就会有一个大的变化。你们景德镇的潜力很大，你们现在有一个宝贝，就像有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关在门里面，没有出来。你们要把“她”放出去，要让人们认识“她”，要让“她”去闯天下。我们要富民的话，首先要搞市场，要看谁需要，农民是最大的市场，他们最需要的是日用陶瓷，你们今天要发展要推销农民需要的日用品陶瓷，要利用我们现有的传统和基础。我从方李莉的考察报告中，了解到景德镇的手工艺陶瓷，已经加入了科学技术的成分，符合我提出来的传统加科技的这一发展方式。你们的瓷窑已产生了变化，不再烧柴已经烧瓦斯



1949

费璞安 70 岁时留影

我在吴江小学里读书时，我的父亲是江苏省的视学，视学是教育督导员。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江苏省境内巡回视察各地的学校。回家期间忙于写视察报告。我常见他书桌上堆满了各地收集来的材料和笔记。有时为了好奇，趁他不在时，我偷偷地去翻阅这些材料。我虽则很多看不懂，现在还记得的是他随班听课的记录，还有评语，某某教师讲解扼要明白等等。他在视察实在就是在做有关当时教育的实地调查。他并没有料到他的儿子中后来会有人继承了他的调查工作。他并没有在我面前讲过要了解社会必须亲自去看去问的道理，但是他作出了身教，身教显然比言教更起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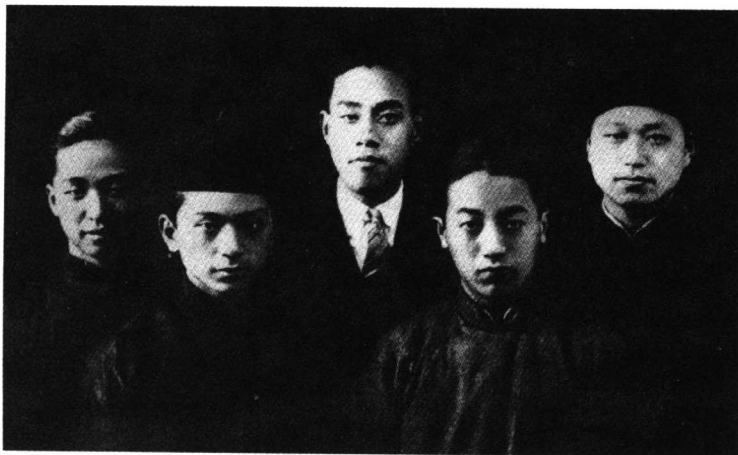
费孝通：《忆小学乡土教育》（1991）

了，陶瓷生产的主要过程是烧炼，主要是通过高热度来使物质产生质的变化，也就是各种化学变化，这是可以利用高科技的一个部分。

在生产中要善于利用高科技，想象力要超越得大一点。我这里要讲一个例子，虽然罗嗦，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有一个朋友叫林兰英，是全国人大的一个常委，她最早是搞半导体的，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半导体，她从美国回来，开创了这个事业。她现在又在搞碳金硅，这种元素的提炼需要很高的热度，在地球上做不到，只有通过地面卫星到宇宙空间去提炼和合成，她利用太空的条件得到一个临时的实验室，得到了一种新的物质材料。为此，她得到了一个霍英东奖。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要说明人要超越常规，有所创新，不要老在格子里边，地球的空间不行还可以到太空里边去找嘛。不要老抓住常规不放，要出点格，要创点新。

我们回顾近百年的手工艺的历史，也要超出去，超越这一百年的框框，把眼光放得更开一点更远一点，才能有个新的看法新的认识，进入新的时代。我希望你们的讨论结果，不仅仅是要看到过去的一百年，还要看到将来，看到一个更好的明天，回顾是为了超越嘛，为了创新嘛。创新不根据旧的东西也很难出新，说到这里我们还是回到了我们今天所讲的公式，那就是传统加科技。结合我们今天的会议，我希望你们已经看到了手工艺的未来，但是没有忘记过去，未来是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怎么在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技术，新的科学思想，把手工艺提高一步，这就是我们这次开会讨论的目的。

最后，我要讲的是中国手工艺的未来，我想以苏州一个刺绣研究所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他们在苏绣上表现中国的水墨画，非常逼真，这种逼真不是指形态上的逼真，而是指神韵上的逼真，这就是艺术。他们发明了一种“乱针



1990

绣”，这是一种新的技术，将一根丝分成许多份，这样就可以绣出一种模模糊糊的像中国水墨画的感觉，它不是线条、也不是色彩，而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是很高层次的艺术感觉。而且这种中国画还不是齐白石的手法，我认为齐白石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对人的文化不能仅仅用实用主义的眼光去看，我们要出点格，要超越些。我们是人，人的要求和需要是超出一般的用处的。就以吃饭为例子，我们不能光讲营养，光讲对身体好不好，还要讲味道。我跑过许多国家，曾问过许多外国人，“你懂不懂鲜不鲜？”“鲜”字英文中我是没有找到的，外国人好像不懂得鲜味，但我们中国人是懂的。我曾到过东北的赫哲族那里，赫哲族是以打渔为生的，当地人请我吃了一顿饭，这顿饭真是鲜极了。但外国人不懂鲜字，只知道好吃。这个鲜就是味道，食物光营养好不行，还要味道好，这个味道就是烹调中的高层次，就像艺术是生活中的高层次一样。

我所提出来的“富民”是生活中最基础的东西，是要吃饱穿暖，这是作为第一步的要求。但作为第二步的要求，就不光是要吃饱，还要“鲜”，要有味道。“味”不仅是一个心理的刺激，物质的刺激，还是一种感觉，这种感觉有时是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也就是说吃饱不吃饱和鲜不鲜是两个层次的东西，高层次的文化要讲究味道。就像我们看画一样，一张画不仅仅是像不像的问题，还应该有一种别有滋味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在“有无”之间，也就是“虚实”之间，这种“有无”之间和“虚实”之间的感觉，就是达到文化的一个高度了，也就是艺术的一个高度了。但我们现在的人还达不到这个高度，我们现在还是在讲实用、讲技术，而不是讲味道、讲艺术。中国人讲艺，是孔子讲的六艺，而不是六技，也就是说艺同技是不同的。

对艺的理解我是从梁思成那里学来的，那时我们住得很近，经常来往。他

费孝通（左四）与校刊同事们合影

1930年我放弃了作一个医生的想法而决定要作一个社会学者。……我不再满足于仅仅帮助个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这个目标。人们的病痛不仅来自身体，来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所以我决心不去学医为一个一个人治病，而要学习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

费孝通：《经历·见解·反思》（1987）

总是讲，建筑师不要做成一个匠人，不要光讲技术，还要讲感觉，讲艺术。技是指做得好不好，准不准，可是艺就不是好不好和准不准的问题了，而是讲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人人都有，但常常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其实也就是一种神韵，韵就是一种韵律，一种风、一种气。这都不是具体的东西，物质的东西。我们平时所讲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样的分法意思太浅了。就是精神文明里面也还可以分两层，一层是人的基本的感觉，比如是痛不痛痒不痒？再进一层就是人的气魄，在这里人浓缩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觉，在一种自然的状态里面，也就是在一个美的状态里面释放出来了。这种释放是很不容易的，往往只有艺术家才能做得到。如果我们的每一行都朝着方面去努力，朝艺术的境界靠近，而不是现在讲的科学的技术境界，这个世界就不同了。当然，我们现在讲艺术，还超前了一点，我们现在应当讲的还是科技，是讲科技兴国。但我们的再下一代人，可能要迎来一个文艺的高潮，到那时可能要文艺兴国之了，要再来一次文艺复兴。对于这个问题你们学艺术的人可能要比我讲得更清楚一点，但我已经感觉到了一个超过一般的生理和心理以外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您们所要研究的内容。我觉得人要追求一个美好的生活，这个美好的生活不仅仅是一个吃饱穿暖的生活。

我最近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富了之后怎么办？我志在富民，这是不错的，但仅仅是富，还够不够？其实人是不会满足于吃饱穿暖的。人要安居乐业，这里的安乐就是高一个层次的追求，而这个追求要有一个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吃饱穿暖就达不到这一点，就接触不到这最高一层。这最高一层的文化就是你们艺术家所要探索的东西，我的老师是不讲这些的，只讲到吃饱穿暖，大家满足生理的需要。需要什么呢？除了物质的需要，还需要 art ,也就



1930

是艺术。艺术的需要是很难用普通的语言来讲的，因为这种需要一般的人还没有感觉到，只有一部分人感觉到了，这就是艺术家，他们有这种感觉，但我们一般普通的人，还是处在吃饱穿暖的阶段。就如从语言到诗歌到唱歌到音乐，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谁都会说话但并不是谁都会写诗歌，就像我知道声音的变化，但要我能知道好听不好听，能不能满足我，这就要学习音乐了。音乐不光是一个声音的刺激，还应该有一个音乐的感觉，这个就不一定大家都有，这要培养。我认为文化的高层次应该是艺术的层次，这是我对生活的一种感悟，但再进一步我就说不出来了，因为我自己在这方面的感觉也还没达到很深的程度。我所努力的还只是要帮助老百姓们吃饱穿暖，不要让他们饥了寒了，这一点我可以体会得到。但再高一层次的要求，也就是美好的生活，这是高层次的超过一般的物质的生活，也是人类今后前进的方向，我就说不清楚了。但我能感觉得到，所以要把它讲出来，而且把它抓住，尽力推动人类的文化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也就是向艺术的境界发展。

在这里我还想讲一个例子，讲一个当年我在扬州的体会。自古以来扬州就是我们江南最繁华的一个地方，“腰缠几百万，骑鹤下扬州嘛”，这是古代的一个繁华的地方。我最早去扬州还是在解放前，到扬州深巷里边去听艺人们唱曲子，那种味真的不同，现在没有了，都是唱卡拉 OK 了。当时，半夜里有人吹笛的声音，真是感动人，让人觉得飘飘忽忽的，朦朦胧胧的，真是到了一种语言达不到的艺术世界里面去了。现在我们人类的文化发展到哪里去？我认为，要发挥精神上的享受，发挥情绪上的感动，朝着这条路线走，最终还是要走到一个艺术的世界里去，这就是人类最终的追求。我想，这也许就是人类文化的最后导向，导向美好世界的追求，这就需要你们艺术家出的力量，来指导

费孝通（前排左三）与东吴大学学刊社全体职员（文理学院）合影

……首先可以提到的是我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动机。我在《乡土中国》一书的导言中有过一段自白。当时作为一个三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处于民族和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很容易意识到个人与社会集体的密切关系，而觉悟到不解决民族和国家的前途问题也就谈不到个人的出路。要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变动的时代里心安理得地做一个自认为是有意义的人，当时像我一样的那些青年人，开始认识到必须对我们所生存在其中的中国社会有清楚的理解，因而要求摸索出一条科学地研究中国社会的道路。

费孝通：《迈向人民的人类学》（1980）

文化的发展。

大家不要满足于放导弹放得准，满足于物质世界的科学，要追求精神世界的美善性，一种超脱了人世的一种感觉。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我们的文化面临着一个挑选，它的发展有两条路线，这是两条很根本的路线，也许这就是不同的东西方文化差别。但追求东方文化境界的时间还没有到，现在谈这些还是超前的，要让人们的生活追求达到一个艺术的境界，先得要有一个物质的基础。大家吃饱了，穿暖了，安居乐业了，就可以在安乐上做文章了，这篇文章谁做呢？这就要我们的艺术家来做了。在艺术家眼里不是讲究机器文明、规模生产、成本降低，艺术家是要不断的加成本，要把精神文明的资源加进去，一生为了一个信仰、一种追求，死而无憾，连生命都可以不要了，这个投资就大了，连生命都投进去了。这是两种世界、两种文化的导向，两种做人不同的路子。当然，这种讲法都是比较超前了，是将明天的话在今天讲了。这种讲法也是我们要回头去看看中国文化的传统，我认为中国文化里至少有一种最接近这种高度艺术的成分。

我在参加这个会议的路上，就一直在想艺术和人类高层次文化的问题。但我已经老了，我只有祝福，有这么一天，有人出来把文化导向改变一下，把对物质发展的导向改变成对精神境界发展的导向。当然不要把这两方面对立起来，我们的艺术要有科学的基础，没有科学的基础是不行的，要利用高科技的成就，至于怎么结合的好，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了。我今天是出了格了，思想也出了格了，讲话也不成体系。但有一点，我的确总是从我看到的事实去探求理解，我这次到景德镇来，看到许多事实都对我有所启发。也是想帮助大家认识到，景德镇的明天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性以及其在发展上的各



1925

王同惠女士与同学留影于燕京大学四院门外

我得识王同惠女士，是在民国二十三年的秋季，我的“文化人类学”的班里。二十四年春她又上了我的“家庭制度”班。从她在班里所写的报告和论文，以及课外和我的谈话里，我发现她是一个肯用思想，而且是对于学问发生了真正兴趣的青年。等到我们接触多了以后，我更发现她不但思想超越，为学勤奋，而且在语言上又有绝对的天才，她在我班里曾译过许上神父（Le P L Schram）所著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译稿在密月中整理完成）；那时她的法文还不过有三年程度，这成绩真是可以使人惊异。

吴文藻：《花篮瑶社会组织·导言》（1936）

种可能性。我希望景德镇这个瓷都，可以发挥它曾在历史上所取得过的艺术成就，历史上中国最有名的手工艺品就是瓷器和丝绸，所以景德镇的陶瓷研究所可以和苏州的丝绸研究所相互交流学习，不断创新，共同把中国的手工艺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为人类追求艺术文化的导向而做出努力。

方李莉录音整理  
2000 年载于《民族艺术》



1935

费孝通和王同惠结婚留影

# 有关开发西部的人文资源的思考



我今天到这里来不是作学术报告，而是想结识一些艺术家的朋友，上个月的8号，曲院长到我家，邀请我到这里来同大家见面，后来身体出了一点小毛病，在医院住了半个月，现在已经恢复了，所以，我来了却这个心愿。今天来开会的新老两个文化部长都是我的朋友，一个是我的老乡（孙家正部长），一个是我五十年前交的朋友（周巍峙老部长）。

五十年前，周总理组织了一个中央民族访问团，我参加了。当时，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是开展民族工作的第一步，这个访问团的目的是到少数民族地区去，开展民族工作。总理认为，接触少数民族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艺术来接触，为此，当时组织了一个文工团。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周巍峙同志。我当时五十岁还不到，现在都九十岁了，一过就是几十年了。所以，我和艺术结缘是从周巍峙同志开始的，当时，他负责文工团，我负责领队出去，我不懂文艺，但职务却是访问团的团长。

总理的想法很远大，他是想我们各民族团结起来，合成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要加强各族人民的凝聚力，而加强凝聚力的办法，就是通过艺术，所以，我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首先组织的就是文工团。后来，这个文工团回来后成立了一个民族歌舞团，这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它成长起来后我就不管了，因为

二十四年八月（1935年），她（王同惠）和费孝通由志同道合的同学，进而结为终身同工的伴侣。我们都为他们欢喜，以为这种婚姻，最理想，最美满。他们在蜜月便应广西省政府的特约出发去研究“特种民族”。行前我们有过多次谈话，大家都是很热烈，很兴奋。我们都认为要充分地了解中国，必须研究中国全部，包括许多非汉民族在内，如能从非汉民族的社会生活上，先下手研究，则回到汉族本部时，必可有较客观的观点，同时这种国内不同的社会类型的比较，于了解民族文化上有极大的用处，我们互相珍重勉励着便分手了。行后常常得到他们的“桂行通讯”和报告，字里行间充满了欢乐，勇敢，新颖，惊奇的印象，读完了总使我兴奋。社会人类学在中国还是一门正在萌芽的学问，一向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我自己数年来悄悄地埋头研究，常有独学无友，孤陋寡闻之感。这一对“能说能做”的小夫妻，真鼓起了我不少勇气。

我不懂艺术。可是，我同艺术接触以后，就觉得总理的看法很重要，我们通过艺术这条路接通和各个民族的关系，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就是新中国第一个做实际民族工作的工作团体，为了能让少数民族欢迎我们，愿意接触我们，那就是开展艺术活动，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总理一再交待我们一定要虚心学习，学习少数民族的歌舞，然后将它们带回来融进我们新的创作中。当时的那些人都老了，许多都已经不在了，胡松华还在，他歌唱得很好，我们还有来往，他还叫我老团长。

我同艺术的关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前几天我还同方李莉讲，你一定要找到周巍峙同志，我不但要恢复我五十年前的关系，我还想发展一步，在五十年前周总理的意思上扩大一步，通过艺术的渠道，和西部的大开发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通过艺术的渠道来了解和开发西部的人文资源。这就是今天要讲题目，即“保护、开发和利用西部的人文资源”，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个题目。

其实我对艺术一直就很有兴趣，五十年前还有过一段缘分，那时我还很想进入这一圈子，而且几乎快进来了。当时彭真是北京市市长，我同他谈了北京有很多有特点的手工艺，比如，景泰蓝就是其中之一，我很想去研究这些手工艺品。那时，我就提出来了要保存和发展我们自己传统的手工艺，但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后来我又去做民族问题研究了，所以北京的对传统手工艺的研究我只是提出来了，但却一直没有机会研究。后来我碰到了方李莉，她到北大来向我学人类学，她想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艺术，我觉得很好。她在博士后期间所作的出站报告是有关景德镇陶瓷艺术的田野考察，后来写成了一本书，我看了觉得写得不错，我很有兴趣。她的研究重新唤起了我的爱好，让我又回到了五十年前想做又没有机会做的事情上。



1939

王同惠女士生前与瑶民合影

他们是9月18日到广西的南宁，当即开始和省政府接洽研究方案，并且就在当地测量特种民族教育师资训练所的苗瑶学生的体质。双十节到了象县，又进行人体测量工作，18日开始入大藤瑶山。因为社区研究需要长时期住定的实地观察，而体质测量又不能不到各村去就地工作，所以由王桑，过门头，到六巷之后，同惠就住下专门担任社会组织的研究，而费孝通则分访各村从事测量工作。11月24日他们离开花蓝瑶区域到坳瑶工作一月，可以到金秀的茶山瑶区域，预计到本年2月可以把大藤瑶山的长毛瑶研究完毕。此后同惠便回到北平，继续在燕京大学作研究工作。谁料竟在12月由古陈赴罗运的道上发生了惨剧。

为此，我还专门去了一趟景德镇，方李莉他们组织了一个学术研讨会“99中国传统手工艺百年回顾”。在那个会上我作了一个发言，我说，我们研究人类学，研究人的文化，人的文化今后最高的发展方向。我认为，从吃饱穿暖了进一步之后，就是进入一个艺术的境界，文化里面的最高一层领域就是追求美，追求艺术。从人类发展的前途来看，首先是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也就是人生存的基本生活的需要，然后再上一层就要满足感情的需要，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与动物不同，就是因为有感情这个东西，把这种感情发挥出来就是艺术。文化最后、最重要的追求就是要进入一个艺术的世界。艺术在人类历史里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了，我看了很多的考古资料，发现中国的艺术和西方的艺术，有个很大的不同点，就是中国艺术里面有玉器，而西方没有。玉器不仅是一门艺术，也代表了一种文化观念，它是中国艺术和西方艺术所形成不同特点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我和我在考古学界的朋友们提到了这个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正在想逐步地认识艺术，想进入这个圈子，我现在还是圈外之人嘛。这一次曲院长请我来讲话，我也想乘机机会，认识认识你们院里的许多艺术家，你们这里是中国艺术人才最集中，也是艺术理论研究层次最高的地方。我希望你们能大大发展，能担任起进一步发展中国文化艺术的责任。

谈到这一点，我就要谈到我们今天谈的题目上去了，谈到有关开发西部的问题上去了，这是党中央和江泽民主席向我们提出的号召。现在我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地步，必须要向西部继续发展，我从1984年、1985年开始研究和注意了西部的问题，当然，我那时想解决的还不是艺术问题，而是怎么样让西部人民吃饱穿暖的问题，因为我一辈子的目标就是“志在富民”。1938年我写了一本书叫《江村经济》，最后的结论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



1938

芳魂永系乡土的王同惠乡间留影

由古陈到罗运的一段山路，极其曲折险峻，而和他们同行的向导，又先行不候，以致他们走迷了路，误入一带竹林之中。林中阴黑，他们摸索着走近一片竹篱，有一似门的设备。以为是已到了近村，孝通入内

贫穷，就是生产力太低。我们中国人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提高我们的生产力，否则我们就存在不下去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普遍的共识，我们党中央的几次大战略都是为了解决这个提高生产力的问题，也就是首先要解决我们的基本生存问题。80年我被取消了右派的帽子，重新恢复了工作，我把它称为是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开始。我又回到我以前的学术起点，调查农村，研究如何提高农民的生产力，我提出了工业下乡，并看出来了发展乡镇企业是一条解决农村贫穷的有效道路。乡镇企业发展以后，我又提出了小城镇的建设问题，现在小城镇的建设正处于一个高潮。但这些研究都是为了解决一个吃饱穿暖和贫穷的问题。

这几年，我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当我们吃饱了和穿暖了后，又该怎么办？这就涉及到了艺术的问题了，我们是不是能再提高一步，在吃饱穿暖的基础上，发展艺术，让我们的精神世界能在艺术里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是我最近想到的一个问题，由这个问题我又想到了西部开发的问题，就是有关西部开发的问题大家谈得很多，但都是偏重于物质方面。物质方面是很重要，但精神方面，也就是文化艺术方面也同样重要。

我记得还是在我读中学的时候，中国的一批科学家和外国的一批科学家组织了一个考察团，到西北考察，他们在那里不但发现了许多的自然资源，也发展了许多的文化资源。在里面有一个叫斯文·哈定的瑞典人，通过这次考察他写了许多的东西，在世界上很有名。也就是通过这次考察，发现了敦煌、丝绸之路上一系列的古代文物和古代艺术，这些都是西北蕴藏的丰富的文化资源。如果，我们要将这些资源发展到我们的文化里面去，开展我们的文化建设，以及确立我们的文化的走向的话，就要在研究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解决

探身视察，不料那是一个瑶人设下的虎阱！机关一踏，木石齐下，把孝通压住。在万千惊乱之中，同惠奋不顾身地把石块逐一移开，但孝通足部已受得伤，不能起立。同惠又赶紧出林呼援。临行她还再三地安慰孝通，便匆匆的走了。她从此一去不返，孝通独自在荒林寒夜中痛苦战栗地过了一夜。次日天刚破晓，便忍痛向外爬行，至薄暮时分，才遇到瑶人，负返邻村。孝通一面住下，一面恳请瑶人四出搜寻，到第七天才在急流的山涧中，发现了同惠的遗体，她已为工作牺牲了，距她与孝通结婚之期才一百零八日。

吴文藻：《花篮瑶社会组织·导言》（1936）